

# 我的文坛师傅们

——《文艺报》生活琐忆

□高洪波

最近追了几部有意思的电视连续剧，从《九部的检察官》到《警察荣誉》，发现“师傅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。我记得从前“师傅”仅仅出现在表现工厂生活的作品中，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很常见。俗话说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，公检法系统的师傅们都是“一带一”的传承，师傅和徒弟之间感情深厚，徒弟对师傅也尊重有加。

今年的教师节，我下意识地想起我的《文艺报》的师傅们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我的第一个师傅——刘锡诚先生以89岁的高龄离世了。当时身为文学评论组的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的他，是我以炮兵排长的身份、从军旅转业到《文艺报》之后的第一个师傅，一直领导了我整整五年的时光。

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老文化部拥有两间办公室，最大的办公室里是刘锡诚、我、雷达、李炳银，还有孙武臣、于建，旁边较小的房间里是我们组的阎纲、郑兴万和晓蓉。当时八个人的文学评论阵容整齐，除了我和李炳银两人是从军营到文坛的新兵，别的几乎都是老大学生。刘锡诚就这样带领着我们走进了最初的思想解放的文坛大潮中，以他的勤勉认真和博学让我深为敬佩。

我们经常认真地分析、讨论文坛的形势，在各自分工的领域提出自己的选题和参加活动的一些报道。我们中午都不回家，夏天时每人铺开一张凉席在各自的办公桌底下休息。有趣的是，雷达经常刚一入睡便鼾声顿起。当大家在他醒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常常严肃而认真，甚至固执地说：“我没有打鼾，从来也没有这个习惯。”他的果决让我们感到可笑，我几次想找个录音机录下雷达的鼾声进行实证，但最后终于没有进行这样伤感情的操作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，因为打鼾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才会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，而雷达在青少年时期肯定不打鼾。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已经人到中年了，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在雷达的鼾声中闭眼养神，继而下午起来工作。

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唐达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和唐达成、雷达三个人都是在1978年8月进入刚复刊的《文艺报》的。而唐达成是文坛的老人，当年由于和周扬同志商榷，最后引发了他命运的改变，想来那个时候的唐达成应该是锐气逼人，而我见到的唐达成已经经历了人世的沧桑，温和且低调。我们相识的时候，共同在礼士胡同129号的一所大宅院里上班，那是当年清代名臣刘庸的府邸，后来又是印尼大



在《文艺报》简易楼前。左起为郑兴万、谢永旺、寒小风、唐达成、高洪波

使馆，里边亭台楼阁、游泳池、放映室一应俱全。回廊深深，庭院悠悠，是非常美丽的办公环境，虽然游泳池没有水而干涸着。

我记得我在这上里了关于新闻写作的第一课，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诗歌采风团的活动，我陪着以艾青、柯岩、雷抒雁等著名诗人为首的一批诗人，到新发现的华北油田采访。回来之后，我需要写一篇短报道，可是很抱歉，我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新闻写作的训练，我抓耳挠腮，苦思冥想地在空旷干涸的游泳池里走来走去。万般无奈时，唐达成看出了我的难处，便问是怎么回事，我如实告诉了他。唐达成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给我讲述了新闻的五要素，然后仔细地告诉我一篇报道文章写作的起承转合——就这样，我完成了我在《文艺报》的第一篇学徒般的作业，这一幕终生难忘。

第三个师傅是陈丹晨。之所以说陈丹晨是我的师傅，是因为他在我们进行编辑职称考试的时候，既是出题官，也是主考官和阅卷老师。那个时候，有一批从兵团、农村、军旅回京的年轻人进入刚刚复刊的《文艺报》。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，参加编辑职称考试的应该是七个人，除了我之外，有工农兵大学生李炳银、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、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、李健吾的女儿李继永，还有一个女编辑于建和美编陈新民。陈丹晨以编辑部副主任的身份为我们设置考题，在考场监督我们答卷。

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地进行了复习之后，完成了

了好几本20世纪50年代的《文艺报》，而且还有竖版的，有的封面竟是名家的版画、油画、木刻等，装帧精美，非常上档次。再看内容，名家济济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难忘一个周日，我在道外三道街旧物市场上看到一本1958年第1期的《文艺报》，我问多少钱，摊主竟张口：“少于30元不卖。”我问：“为啥这么贵？”摊主说：“你自己看。”我翻看发现刊中竟有一精美插图，“齐白石像（油画）吴作人作”。摊主说：“这幅画你查查就知道了。”经过讨价还价，最终以25元买下了这本《文艺报》。后来我才知道这幅画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，是著名画家吴作人1954年创作的名作。

“蕙袭致功，必有丰殷”。2022年秋天，我于道外旧物市场淘到的1960年13—14期，是“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”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（扩大）会议”专号。更有今年夏天在松花江公路大桥下旧物市场淘到的1962年5—6期，是“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二十周年”专刊等。这些都是《文艺报》的历史珍品，内容异常丰富，图文并茂，十分难得。至今，我已经在旧物市场淘到了20世纪的《文艺报》近160多本。

从第一天接触《文艺报》算起，已有四十年时间。无论工作怎样转换，岁月如何更替，也许是与政研室老主任说的“《文艺报》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一面镜子”那句话有关吧，反正我挺喜欢读文艺评论性文章，读《文艺报》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，也常常从中获益匪浅。《文艺报》是我读书、写作的良师益友，与《文艺报》相伴期间，我的文章有幸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求是》《人民论坛》等报刊。

如今赶上好时代，现在读《文艺报》有三种渠道了：一是可以“云上”阅读，打开微信公众号“文艺报1949”，点击“服务”里的“数字报”选项，就能轻松阅读；二是可以去省市图书馆拿报阅读，这样便于摘抄金句；三是可以去旧物市场淘收藏阅读。时代与社会进步了，和《文艺报》相伴也更容易了。

我的师傅陈丹晨给我们布置的第一个《文艺报》的职称考试的作业。我的分数还不错，排在第一，这使我非常开心。具体考试的题目现在已然忘却，毕竟已经经过了四十多个春秋，但这次考试使我的知识结构得以顺利完善。几年后，我到宁夏银川进行西部采访的时候，还为“张贤亮算不算知识分子”写了一篇内参。因为张贤亮要为自己的高级职称补考高中语文，这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滑稽，于是我写下了这篇内参文章，这对当时的张贤亮还真有不小的帮助。

我的文坛师傅们，除了前面说到的三位，还有谢永旺（笔名沐阳）。他当时是《文艺报》的编辑部主任，在我们这批年轻人刚刚进入《文艺报》的时候，是他给我们布置的阅读任务——先静静地读《文艺报》合订本阅读半个月，然后再进入工作。也正是谢永旺跟我们推心置腹地谈道，《文艺报》的岗位很重要，文艺评论工作很重要，我们要向俄国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一样，以编《祖国纪事》为终生的荣耀，死后要枕着《祖国纪事》安葬。谢永旺举别林斯基的例子，是给我们上了编辑的第一课，所以他也是我心中的师傅。

最后一位师傅应该是冯牧先生了，他当时是《文艺报》的主编，他的言谈举止，他的为人和为文都深刻地影响着我。以至于最后我离开《文艺报》，经历中国作协办公厅几年的工作之后，仍然回到了编辑岗位——在《中国作家》担任副主编。那时《中国作家》的主编正是我当年在《文艺报》的老主编冯牧先生。我一直陪伴了他五年，到最后为他送行，还和李迪同志一起编了一本悼念冯牧先生的文集——《远行的冯牧》。冯牧先生在文坛是有口皆碑的好人，我不必多说。他等于在两个时间段充当了我的师傅：一个是《文艺报》十年，一个是《中国作家》五年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在《文艺报》前期工作的五年是我学习、更新储备知识的特别重要的五年。我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时间段，是因为1983年之后，77届和78届的文科大学生们毕业分配进了《文艺报》，新生力量如贺绍俊、潘凯雄、朱辉、赵小明等进入了我们的团队，于是我们由新兵变成了老兵，也由徒弟熬成了师傅——这批受过正规训练的中文系的伙伴们的到来，使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出师了。其实，我从云南进入文艺界时的最初印象，对长者的称呼只有两个字：老师。“老师”和“师傅”之间，我认为是可以画上等号的。祝世上所有的师傅和老师们幸福安康。

# 三十三载，一段深情

——祝贺《文艺报》七十五周年生日

□查理森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淮南岸龙子湖畔的安徽财贸学院工作，岗位是校报（那时还叫校刊）编辑。因为是中文系的毕业生，又对新闻工作尤其是报刊业充满热爱，所以，尽管和社会上那些正式公开发行的省市日报及专业报比起来，校报只能算是内部报刊，但我也一丝不苟地精心采编。我还办了文学副刊，给师生的业余文学创作提供平台。

要编好文学副刊，自己的文学写作能力及文学鉴赏水平就不能太差。为此，除了认真研读国内外经典文学名著外，我还广泛阅读当时的多种文学报刊，自己也尝试着搞点创作，写一些小小说、散文之类的文字。但更多的还是仗着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理论功底，勤奋地撰写文学批评类的文章，为当时优秀的文学作品唱赞歌，也对一些不好的创作风气提意见，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了些稿件。当时，创作界思想解放，意识流、魔幻现实主义、传统现实主义等各种创作方法同台竞技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但不可否认，也出现了摒弃传统、一味摹写西方现代派的作品。

正巧，那段时间，我从《长江》《长城》两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了《党委书记》《现场会》两部以基层干部为主角的中篇小说，感觉眼前一亮，十分欣喜。我认真阅读之后做了些思考，把如何塑造好党的基层干部形象作为一个题目进行研究，最终形成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文章《塑造更多党的基层干部形象》。在文中我满怀深情地写道：“可喜的是，我们有一大批勤勤恳恳踏实工作的党的基层干部，宋波和邓军生便是这样的典型代表……而我们的文学家们，不是更应该去写一写这样的人，塑造出更多的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，来丰富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吗？”

文章写好后，我考虑着往哪儿投。那个年代，通讯没有现在发达，稿件信件来往都是通过邮局，编辑和作者多数只在版面上见过，如果不是有特别原因，很多都不相识。

虽然在那之前，我曾在《戏剧与电影》《青年批评家》等省内外报刊发表过几篇文学评论，但算起来那都是省级刊物。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，向国家级报刊“高攀”一次呢？于是，我想到了《文艺报》。在我心中，《文艺报》是代表了文学界最高水平的报纸，无论是以杂志形式出版还是以报纸形式出版，我都一直是《文艺报》的忠实读者。《文艺报》刊载的各家文章启发了我的思路，开阔了我的眼界。而《文艺报》对文学动态的报道，又使我虽身在淮滨城市，却能对全国文学状态有所了解。这样的一份报纸，真是我的良师益友。可这样一份我始终仰望的报纸，能接受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稿吗？思前想后，把稿子改了又改，我还是下定决心，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，按照报纸上的地址，把稿件直接寄给了《文艺报》编辑部。因为不认识任何一个编辑，便在收件处写上了“编辑老师收”。

稿子寄出时，正值新学期开学不久，学校工作很忙，校报报道任务很重，我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注稿件的命运。直到有一天晚上下班后，我照例到校宣传部资料室读书看报，在新到的一期《文艺报》一版报眉的醒目处，看到了我那篇文章的标题，心跳一下子加速，我急切地翻到第二版，我的文章真实地被刊登在头条位置！像做梦一样，有点不敢相信，读了好几遍，才确认确实是我写的，几乎一字未改！

大约一周后，我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样报；又隔了些日子，收到了稿酬。同事们都向我祝贺，说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文章，不简单，你简直就是评论家了！虽然是玩笑话，我听着也十分受用。

我知道，《文艺报》能从自然来稿选中我的稿件，并不是因为我的稿子有多么高的水平，而是我对文学创作的现实作了恳切的评论，并表达了对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期待，这正是大家共同的心愿。

尽管后来我并没有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工作，但是《文艺报》却始终是我阅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报纸，也一直想着哪一天能再在报上占一角之地，发表自己的作品。这个愿望终于在距上一次的三十三年后实现了！今年1月的“新作品”版刊发了我的散文《十八楼窗外的风景》，给正在术后疗养的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。在此，我以一个“老朋友”的身份，由衷地祝愿《文艺报》越办越好，成为文学界的旗帜，成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永远生机勃勃、蓬勃兴旺的精神家园！

# 《文艺报》伴我走过青春

□朱应召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广东打工，由于热爱文学、热衷文艺，厂里却看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报刊，所以我决定用微薄的薪水自费订阅。

到了邮局后，我翻看着报刊名录，发现了《文艺报》，了解到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文艺类报纸，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，得到过毛泽东、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。茅盾、丁玲、冯雪峰、张光年、冯牧等文学大家曾领军《文艺报》。新中国的文艺风云与《文艺报》密切相关，历史奠定了《文艺报》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和权威地位……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当即订阅了一份，之后便盼望星月交辉地等待报纸的到来。

由于《文艺报》是在北京编辑出版的报纸，而我身在广东，路途遥远，再加上当时发行渠道没有如今便利，所以收到报纸的时候，往往过了一个星期甚至更多的时间。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我的阅读热情和对报纸的喜爱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由于厂里人多，等我忙完工作去门卫室拿的时候，往往被告知报纸已经被别人拿走阅读，让我自行去找人讨要。

于是，我不得不串车间、串宿舍地到处寻找，就这么阴差阳错结识了更多工友。其中不乏有着共同兴趣爱好、彼此志趣相投的，经过交往，大部分都成了知交挚友，这也算是我订阅《文艺报》的一个额外收获了。

由于自费订阅《文艺报》，我成了厂里的“知名人物”。当时的第一代打工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，厂里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管理。老板觉得我有文化基础又热爱学习，所以破格提拔我当了主管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。我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工作的同时，带领更多同事工余读报、业余学习，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水平。我订阅的那份《文艺报》，也因此成了大家学习的教材。

受我的影响与启发，不少同事喜欢上了读书看报，我更是走上了业余写作的道路。在广东打工期间，我先后出版了《管人笔记》《尖刀团队特训记》等图书，参与撰写了广东电视台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的分集剧本。如今，回到家乡河南郸城的我，先后加入了郸城县作家协会、周口市作家协会、河南省作家协会，创作出的作品多次荣获全国、省、市级奖励。2024年3月，我单独创作的院线电影剧本《桃李春歌》更是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核，进行了立项公示，进入了紧张的筹拍阶段。

这一切，都源于当初我在广东打工时，订阅的那份《文艺报》——可以说，是《文艺报》伴我走过了青春，为我的人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，因此，我非常感激《文艺报》。在《文艺报》创刊75周年之际，我把这段往事写出来，我想真诚地说一声：谢谢你，《文艺报》！祝你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团结和带领全国各行业的文艺工作者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佳绩，拥有更辉煌的明天！



# 认识《文艺报》

□苏介华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在读中等专业学校时，在学校阅览室里第一次翻阅《文艺报》。那时还是周报，很好看，我每篇必读。这对我日后坚持写日记，参加工作后一直想在报刊上发表“小豆腐块”有深远的影响。可以说，《文艺报》是我的恩师。

2023年，我到县文联工作。文联办公室就有《文艺报》，每周有三期，每周一、三、五出版，每期我必读。看见好的文章，我会收藏报纸；有时读到好文章时，我会第一时间用手机拍下来先收存。《文艺报》现在办得很好，还有电子版，有时出差、下乡在外，看不到纸质版时，我就拿出手机阅读《文艺报》的电子版。《文艺报》看不到重要新闻、文学评论、艺术评论、世界文坛、少儿文艺、少数民族文艺、副刊、新作品等版面，每个版面都有看点，有时间我会通读，没有时间我会选读，从上面学到不少东西。对有关烟火人间的文章我特别喜欢看，至今收藏有《一个村庄的剪影》《高高的兴安岭》等文章。

一开始，我以为《文艺报》是县文联自己出钱订阅的报纸，可到岁末年初订报纸时，它却没有在必须订阅的报刊范围内。我问了曾在县文联工作的同志，他们都说“近几年每年都有《文艺报》，应该是在上级文联、作协关心下赠阅的”。在我们准备订报刊时，邮递员送来了2024年的新报纸，里面依然有《文艺报》，这令我们感激不尽。

如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想早日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我最好的“豆腐块”文章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……

# 相伴四十秋

□田广学

1984年春，我有幸调入了政研室工作。政研室又被誉为领导决策的“参谋部”，是喜欢写作的人都向往的地方。从小喜欢看书的医生爸爸和念大学、有出息的哥哥的影响，我喜欢看书、写作。上中学后，在学校各种征文活动中都获过奖，参加工作后的业余时间也依旧热爱读书、写作。政研室里最让我着迷的是阅览室，简直就是一个微型图书馆，当时国内的各种报刊几乎是应有尽有。也许是缘分使然，我第一天走进阅览室时，就喜欢上了《文艺报》。

清晰地记得，当时书架的格子上有三本《文艺报》（1984年1期至3期）。出于好奇，我拿起了最上面的1984年3期，封面的红色装帧很好看，封二、封三和封底的美术作品也让人喜欢。我看内容感觉这是一本文学艺术类理论与评论性刊物，很深邃、高端，对于我这样初出茅庐之人可能并不对口；可我翻看着，渐渐很难放下，感觉所发表的文章对作品的分析评价很有分量，甚至很“苛刻”，不禁越看越想往下看……我回过高中副校长出身的政研室老主任对《文艺报》的看法，他说了让我至今铭记的一句话：“《文艺报》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一面镜子。”

1985年底，文质彬彬又和善的老主任拉出了1986年阅览室拟征订的报刊明细，征求大家意见。我发现没有《文艺报》，问为啥不订《文艺报》？老主任说：“三十多号人就我一人看，别订了。”我忙说：“还有我呢！”老主任笑了，说：“那就继续订吧。”

由于越看越上瘾，我从进入政研室的第二年就起用专门的笔记本开始了“《文艺报》金句摘抄”——就是把《文艺报》中自己喜欢的名人名言摘抄下来，每年能摘抄两三本。后来，我虽然调离了政研室，一旦有空还是坚持去政研室的阅览室读《文艺报》，搞摘抄。再后来，政研室的老主任去世了，政研室也没有《文艺报》了，我就去省市图书馆继续阅读。

2000年初，一位文友告诉我，周六周日去旧物市场淘到难得的旧报刊和老书。有道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2000年春节后的一个周六，我在松花江公路大桥下的旧物市场意外地淘到